

关怀伦理视角下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路径建构研究

武文颖 管声华

摘要:在数字迁徙的背景下,当代人的生活空间逐渐向数字空间拓展乃至转移。对此,数字中国持续发展深度推进了生存的数字化转型,但仍有各类数字弱势群体的存在。其中,代际鸿沟问题和普遍长寿现状使得老年人数字融入成为一个被特别关注的问题。实现自我价值并追求幸福是老年人应有的权利,但基于其脆弱性的特征,老年人应得到“关怀”的帮助。以诺丁斯为代表的强调关系性的关怀伦理对关怀关系的形成提出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相遇和关怀者对被关怀者需要的回应。数字迁徙使得关怀关系得以形成的场域随之拓宽和位移,关怀理论在此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角度,从而回答促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原因和方法。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推进老年人良性融入数字环境的实践路径应从构建相遇空间、凝聚社会合力、识别真实需要这三个维度展开。

关键词:关怀伦理;数字鸿沟;数字融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1-005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XW087)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中国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数字中国的赋能效应更加凸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数字领域逐步实现深度落实。但与此同时,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情况持续存在,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依然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挑战。^[1]聚焦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学术界提出了“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策略。现有研究通常立足社会现实,以国家出台的各类政策法规为指导,提倡通过多元化、多主体的手段提升老年人的数字能力和数字素养,加速推进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利用技术手段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长远目标。倡导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源于权威组织提出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实证研究,即通过研究数字素养和数字融入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等论题,提出支持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观点和措施^[2-4]。但在该领域中,从理论出发来追溯这一论题之“必要性”,且在此基础上构建实践路径的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以合适的形式实现老年人数字融入,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还需要将理论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数字实践。因此,本研究将以关系进路的关怀伦理为理论切入点,构建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的可行路径。

运用关怀伦理阐述养老等问题的研究不在少数,然而,多数学者仅指出关怀伦理的视角有益于人们改善对赡养老年人的看法,对于改善路径的刻画并没有体现出与关怀伦理的密切联系;再者,现有研究所强调的“关怀”是一种实践的“状态”,意味着“关怀”在实践过程中仅仅充当实践主体的“态度”,并没有深入分析关怀伦理中“关系”“回应”“需要”等概念的重要性及其应用,也忽视了老年人在关怀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外,部分研究试图直接将关怀伦理融入社会公共政策^[5-6],忽略了关怀伦理是从家庭领域所诞生的重要特点。综上,这与作为一种理论的关怀伦理相去甚远。对

此,本研究尝试为数字融入领域的现有研究增添新维度,在厘清老年人数字融入困境及其原因的基础上,运用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以“关系性”为主要特征的关怀伦理理论^{[7][12]},围绕其“关系-回应-需要”原则,阐释数字化进程中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必要性,并基于此将理论中的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策略,为破解老年数字鸿沟提供伦理层面的实践进路。

一、“排斥”走向“融入”:老年人数字融入的良性观

(一)从数字鸿沟到良性数字融入

数字鸿沟意指信息通讯技术的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入、使用、获取信息和知识等方面的鸿沟,也是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等问题在数字时代的延续。^[8]中国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后,数字鸿沟被表述为部分群体由于政治、经济、知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数字化时代发生脱节。^[9]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演进,对数字鸿沟更恰切的理解为: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10]的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入,使用,获取信息、知识、服务和利益等方面产生的鸿沟。数字鸿沟引发了数字领域内的群体分化,是数字弱势群体产生的根源。^[11]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数字弱势群体有着不同的内涵。一般而言,学术界通常把少数族裔、老年人和残疾人这三类群体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研究对象。^[12]^[1]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在弱势的一方体现为遭遇数字排斥,即部分群体由于被排斥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之外,且无法接触到前沿技术的应用成果,导致这些人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被削弱^[13]。社会排斥指的是无法有效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被疏远甚至隔离至主流社会之外^[14],数字排斥的概念由此延伸而来,是社会排斥在数字化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

数字融入则是针对数字排斥所提出的反面概念^[15],是弥合数字鸿沟的行动和过程,其各项举措均致力于让社会成员享受信息社会的均等服务,缩小“数字原住民”与数字弱势群体之间的距离^[9]。对于老年人来说,数字融入的客体主要指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中提供的各类数字化服务,它们存在于交通、医疗、消费、文娱等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重要场景^[9]。另一个类似的概念是数字包容。在提及数字包容的现有国内文献中,这一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方式中的“包容”指向对“融入”和“断连”这两种状态的包容,譬如陈雪薇等通过对断连缘由的剖析,将数字包容解释为个体对他人延迟回复信息等断连方式的理解、包容和尊重^[16];周裕琼等基于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强调“数字断连”也可以是自主自愿的选择,应从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层面规划更为友好的数字包容性社会^[17]。第二种理解方式则与数字融入的概念类似。闫慧等归纳了国内外研究中理解数字包容的五个角度,分别强调技术的接入与使用、参与社会活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突破社会壁垒以及消减数字鸿沟。^[18]本研究由此延伸出针对老年人这一群体的“良性数字融入”概念,它既以老年人作为“数字融入”主体的单方向行动为基础,确保老年人能够主动参与数字生活、获取均等服务,又依托“数字包容”所凝聚的多元主体合力,旨在构建一个包容性的数字社会。“良性”的特质主要体现在过程的适切性、主体的能动性以及结果的可持续性。

(二)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困境及其根源

针对不同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既有共通性,也各有其特殊性。老年人的数字融入问题根据老年数字鸿沟提出,而老年数字鸿沟是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两大社会现象相互碰撞的产物^[19]。武小西指出,之所以数字融入的问题(在年龄层面)只针对老年人提出,而通常不对中青年人构成问题,是因为老年人“弱者形象”的社会心理建构和倾向于从已知中获取满足的传统观念惯性限制了老年人积极探索新的知识和技术;另外,老年人在社会中被边缘化,接入的需求随之降低。^[20]老年人群体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群体,他们的数字化生存水平也不同质。但是,老年人群体在数字化社会中有很多可识别的共性特征和问题,这使得我们可以将“老年人”视为一个相对同质的整体来

进行研究。

首先,代际鸿沟导致老年人面临数字融入困难。老年人出生在前数字时代,受前数字化的社会影响较深,不仅在新媒体的接入、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观念乃至价值观上与年轻世代有着较大的差距^[21],更在应对整体性的生活方面与年轻人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心理特征上,老年人更加重视个人经历和传统观念,偏爱旧日的习惯和想法;同时,随着记忆力的衰退和学习能力的减弱^{[22]¹¹⁰},对于新兴事物和思想观念的接纳速度和接受程度通常低于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老年人习惯以具身、在场的方式处理生活事务,以传统、规律的形式进行人际交往,更乐于接受线下面对面式的关怀和服务,更易于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对技术的使用和被中介了的沟通交往抱有犹豫甚至抵触的态度。在认知形式上,老年人倾向于依赖经验和直观判断;相比数字技术与数字服务的运行逻辑和专业语言,老年人更熟悉传统的社会运行模式和生活语言,因此在数字化社会的生存中容易出现“文化休克”症状。

其次,普遍长寿迫使老年人抉择是否尝试数字融入。1949 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35 岁^[23],而到了 2035 年,这个数据将变为 81.3 岁^[24]。这意味着老年阶段将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老年人的生活规划应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所面临的问题对于全社会而言不再是短期问题、个别问题和可以被悬置的问题。

最后,除了受个体层面的生理特征与成长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指出,当下老年人数字融入仍然存在困难的原因还体现在以下维度。代际反哺层面,子女社会经济地位、沟通频率等均会影响反哺效果^[25],而“代理式反哺”虽避免了老年人遭遇网络风险,却剥夺了其自主学习的机会^[26];代际反哺中的延迟性互惠与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即时性需求存在错位,从而降低反哺实效^[27]。社会协同层面,由于社会缺乏对老年人数字身份的正面认知与接纳,他者认同的缺失使得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难以获得归属感^[28];多元主体针对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合作则缺少细致的权责界定、激励政策与监督评价体系,导致各方力量难以形成合力;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等数字陷阱问题,既降低了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意愿,也解构了其对数字环境的信任^[25]。宏观政策层面,智慧养老政策存在精细化不足的问题,政策间重复率高、针对性不强,未能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异质性需求;政策执行中缺乏统筹规划与统一的行业标准,导致涉老数据流通不畅、资源整合效率低下^[29];部分政策工具与理论研究的协同度有待加强^[30]。技术条件层面,现有数字技术多停留于大字体、高对比度等“适老化”表层改造,缺乏“乐老化”创新,人机交互优化不足^[28];部分适老化设计暗含年龄刻板印象,加剧了老年人的数字畏惧心理。

总体而言,过往研究偏好聚焦“如何融入”(方法论)而回避“为何融入”(价值论)。抉择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在观念上随之产生改变,更意味着要在实践上付诸行动。数字化生存本身就有诸多消极现象长期被学界以各种角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包括但不限于电子设备使用与网络成瘾损害身心健康、隐私泄露与数据安全问题、算法偏见对人类认知和公平正义的威胁、数字劳工与资本剥削问题等。相比起中青年人,老年人在数字化生存中更容易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数字融入同时也代表着与潜在风险更加靠近。因此,老年人是否应该数字融入不仅仅是一个选择性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审慎评估的问题。数字融入所带来的相关利益与潜在风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衡,只有充分的理论支持才能证明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不同于现有研究,本研究选择了另外一种道路:先从关怀伦理的理论出发,将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应然依据”与关怀关系的形成逻辑深度结合,厘清“为何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是必要的”,再以此“必要性”为奠基,构建关怀伦理视角下的数字融入实践路径。

二、“需要”应被“回应”: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必要性

西方关怀伦理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由卡罗尔·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以《不同的声音——心理

学理论与妇女发展》(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初创,经诺丁斯以《关怀:伦理与道德教育的女性主义进路》(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系统化后,逐步形成关系进路、活动进路、工作进路、实践与价值进路、美德进路五种核心研究进路^[31]。相比之下,关系进路的理论与老年人数字融入问题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性: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常依赖具体场景中的针对性支持,而该理论的核心正是“关怀者—被关怀者”的互惠关系,聚焦关怀双方的直接接触与持续互动。透过诺丁斯关怀伦理的理论之窗,首先看到的是新视角折射出的新现象,即“潜在关怀场域的位移”与“关怀关系的缺失”,这为理解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伦理解释维度。

(一) 关怀关系的形成依赖于相遇和回应

上文提到,随着我国老年人普遍长寿的趋势日益明显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阶段的生命规划和社会参与逐渐彰显出其重要性。老年人的知识观念与社会主流群体存在代际鸿沟,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则因年龄增长有所衰退,身体机能和行动能力的弱化亦限制了他们的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老年人具有脆弱性的特征。关怀伦理则很好地弥补了理性主义的正义伦理理论的某些缺失,“关怀伦理学尤为重视脆弱性的问题,因为关怀伦理学认为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并不是完全独立、自足的理性存在者,相反,人是依赖性的、情感性的理性动物。”^[32]当老年人需要规划自己的生活并参与社会活动,而又不具有完全的理性和能力实现这一需求时,关怀就应当适时地介入其中,成为实现目标的一种辅助手段。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具有脆弱性的老年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恰当的关怀。一方面,主流话语对依赖、关怀和照顾等概念的消极理解往往会让老年人羞于表达自身需求、放弃对依赖的索取并主动回避他人所给予的关怀。另一方面,在家庭赡养和社会赡养的过程中,赡养主体并未给予老年人合理的关怀。亲人以及社会养老组织在某些时候并不是通过倾听和回应老年人的需求来进行关怀,而是将个人的或公共的意愿以关怀的名义强加给老年人,这可能引起老年人的抵触和负面情绪。这种家长式作风正是关怀伦理所拒斥的。这些现象正说明了以恰当的方式给予老年人充足关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换言之,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价值追求应由家庭关怀和社会关怀所保障。

在关怀伦理的理论视域中,“关怀”有着很高的标准,关怀关系的形成也有相应的前提条件,只有满足这些前提条件才能在关系中完成有效的关怀。首先,关怀不应仅从关怀者的角度进行刻画,被关怀者也应被纳入对关怀行动的考察。同样,如果把关怀当作一种美德来描述,我们可以发现美德属性通常需要一个载体,而载体仅仅是关怀的主体而不涉及关怀的客体。这些定义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被关怀者的真实需要。基于此,诺丁斯开辟了关怀伦理的关系进路,强调应从关系属性着眼来刻画关怀。^{[7]12}其次,关怀不是移情而是同情,不是投射而是接受。用移情来解释关怀虽然看似慷慨,但这一过程却是单方向、机械性和强制性的。诺丁斯深受物理学对 sympathy 的解释启发,认为同情(sympathy)或者说共同感受的概念才更加接近关怀时关注的情感状态^{[7]14}。如果说移情的投射是情感从关怀者到被关怀者的单方向流动,那么同情的接受则是情感的双向交互过程,包括关怀者朝向被关怀者的敞开以及后者诉求向前者的流动。

在对关怀的否定面向进行澄清后,诺丁斯便提出了对关怀的理论建构。首先,关怀的出发点是相遇,相遇是产生关怀的前提。其次,相遇中的一方或双方有着特定的需要是形成关怀伦理意义上的相遇的必要条件。关怀性相遇的根本特征是接受性的关注。“关怀者 A 如其所是地接受 B。但是,仅有关注是不够的。A 必须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7]17}这意味着要想形成关怀性相遇,关怀者一方面需要关注被关怀者,另一方面则要让自己处于随时准备回应的状态,关怀者对于被关怀者来说应当是“可及的”。在生活的某些场景中,我们可能仅在语言上表达了对他人的关心,但其实并不准备耐心地倾听对方的需求并进行回应,在关怀伦理看来,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关怀性相遇状态,关怀者在此情境下并不“在场”,对潜在被关怀者来说是“不可及的”。再次,在关怀性的相遇中,关怀对

于相遇的双方是相互性的。相互性并不意指被关怀者要反过来成为关怀者进行关怀,而是指出,只有当被关怀者体察到并且承认、回应关怀者的关怀时,关怀关系才真正形成。综上所述,诺丁斯用以下语言来描述关怀的情境:A、B 形成了关怀关系(或相遇),当且仅当:

1. A 关怀 B——即 A 的意识特征是关注与动机移置,而且
2. A 做出与 1 相符的行为,而且
3. B 承认 A 关怀 B。^{[7]18}

(二) 生活空间的数字迁徙决定融入的必要性

上文已论述,老年人应当规划并享有晚年的幸福,但由于其特殊的脆弱性,老年人“需要”关怀的“回应”。从实践上落实这一点,首先应对“需要”的概念和内容进行深入的理解和研判。在明确了老年人的需要后,通过把握“当今社会的生活空间正在逐步进行数字迁徙”的现状,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字融入对于老年人而言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数字融入对老年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推断的需要”。换言之,数字空间的迁徙使传统关怀场域发生一定程度的解构,必须通过技术重构新的关怀接触点。

对于识别并阐明不同群体的需要这一工作,关怀伦理学家与其他理论的倡导者一样感到为难。诺丁斯认为,对于生理需要的识别相对较为容易,因为即使对于不同年龄、性别和文化的人来说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其具有易于观测的生理表征,譬如“所有的人都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安全感”^{[7]59}。对于其他需要的识别就要困难许多。诺丁斯另辟蹊径,通过“从理想家庭到理想国”的独特方法,将家庭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模型,定义和论述人的基本需要。她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凡是具有母性的人都必须对孩子的生存、发展和可接受性的培养这三大需要作出回应。^{[7]63} 个体基本的需要涵盖生理需要(包括生存、安全和爱,或称为关涉生存的需要)、关涉发展和可接受性的需要。这里的“可接受性”主要指一种回应他人的能力、一种“有助于人”的愿望,这一需要在晚年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就脆弱性的特征来说,相比起成年人里的中青年人,老年人在被关怀的层面上更接近儿童。因此,从这三类需要出发进而分析老年人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除此之外,对于需要的研究还应关注明示的需要和推断的需要这两个概念。简而言之,明示的需要产生于被关怀者的意识或行为,内在于被关怀者;推断的需要不直接产生于被关怀者,而是综合考虑被关怀者的情况、关怀者可利用的资源以及外部环境的要求后推断出的需要。举例来说,老年人在饥饿时进食的需要是一种明示的需要;而老年人接受教育的需要可能就并不来自老年人本身的意愿,而是在慎思老年人的各方面条件、其子女(此情景中的关怀者)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处社会的文化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后得出的需要。

对于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认识,同样应从涉及生存、发展和可接受性的基本需要开始。数字迁徙的社会背景为关怀带来了两个层次的变化。其一,由于当代人的生活空间逐渐向数字空间拓展,关怀关系得以形成的场域更加宽广、可行的手段更加丰富。以涉及生存的需要为例,网上购物、外卖送菜、线上问诊等技术能够让数字融入后的老年人更便捷地受益于关怀者的关怀,从而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以涉及可接受性的需要为例,护理机器人被认为能够弥补老年人因为生理衰退而带来的自主性缺失^[20];类似地,物联网、智能家居将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对他人的依赖,老年人也能通过技术手段延展自身的能动性,在回应乃至帮助他人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可接受性。其二,由于当代人的生活空间逐渐向数字空间转移,关怀关系得以形成的场域发生了位移,可行的手段新旧更替。在当下,数字技术的覆盖蔓延促使许多活动和服务由线下转移至线上,更多交往行为由线下空间迁徙至数字空间。对于未完成数字融入的老年人来说,许多原本的潜在关怀者由“在场”变为“缺席”,由“可及”变为“不可及”,也意味着关怀者与被关怀者无法获得关怀形成的前提——相遇。不可及的关怀者自然无法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回应。而在诺丁斯看来,“如果一个政策或规定无法使当事人对其掌管或控制的人作出积极的回应,那么这一政策或规定就不应被制定。”^{[7]5} 进而言之,社会各方为关怀老年人所提出的措施应当是能够被关怀的主体所落实的。目前,我国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依

然严峻,但是社会运行的某些环节与诺丁斯的这一思想恰恰是相悖的。举例来说,部分公共场所仅在线上发布临时关闭的通知,导致老年人无法及时、准确地获知信息;某些福利措施仅开放线上申请渠道,导致相关老年人错失申请机会;新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产品虽为社会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却也难以惠及数字排斥下的老年人……在未能接收到关怀信号的情况下,老年人显然无法识别、承认和回应关怀,很多基本的需要在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下反而无法被满足。在关怀伦理的理论框架中,这就意味着关怀关系从根本上没有形成。

因此,如果老年人数字融入是非必要的,那么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人际交往就应当为非数字化的生活方式留有充足的余地,前者作为后者的充分条件。问题就在于,“充足”在当下乃至未来的社会环境中无法得到保障。一者,占据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会在无形中入侵、蔓延至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个体依赖于他者和集体而生存,势必会受到影响。二者,许多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包括以惠及老年人为目标的措施,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比如“互联网+政务服务”与“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的实现都依赖社会各个群体的数字融入。子女、亲友或许能偶尔、暂时代理代办,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并非长久之策,这也有损老年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和对自主性、能动性的表达。最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数字融入具有必要性;作为关怀者,社会各界早已形成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的意识,在这条道路上付出了诸多努力;数字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也为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社会提供了基础保障: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同时构成了使“老年人数字融入”成为对老年人来说的一项“推断的需要”的条件。因此,为了避免数字场域的关怀缺失导致老年人三类基本需要的满足受阻,当下亟待构建起基于数字融入的新型关怀响应机制。

三、“关怀”凝聚“合力”: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的路径建构

立足于以关系性为主要特征的关怀伦理,本研究就能够针对现存问题,对促进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以及构建一个包容性的数字社会展开探析。在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里,倡导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主要目的可以表述如下: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有效地落实对老年人的关怀,从而帮助其享有晚年的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主要应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使得关怀“关系”能够被坚实地确立,并且保证关怀者能够持续处于可及的状态;其二,为关怀主体赋能,从而提升其“回应”能力,同时推动老年人成为自己的关怀者;其三,识别并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要”,实现关怀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基于“关系-回应-需要”这一逻辑链条,本研究提出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三个关键维度:构建相遇空间、凝聚社会合力和识别真实需要,进而在关怀伦理的方法论指导下建构具体的实践路径,将倡导老年人单向数字融入的局面逐渐推向全社会、多主体共同助力老年人良性参与数字社会的未来。

(一) 构建相遇空间,形成关怀关系

理论中的“相遇”和“形成关怀关系”折射出同等的含义,因此,保障关怀意味着让相遇得以可能。当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交织得愈加紧密,数字交往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唯有邀请老年人踏入数字世界的大门,才能在“新质”空间中完成无数的相遇与关怀。

把握适老导向,发展融入工具。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内在要求重视老年人的特殊性,这首先体现在数字技术的适老化高质量发展中。老年人操作和利用数字化服务客体所必需的工具主要分为无形的应用程序和有形的数字终端设备两类。^[9]工具适老化程度的不足将直接阻碍关怀者与被关怀者在数字场域中形成有效“相遇”,而“相遇”正是关怀“关系”建立的首要前提。在有形层面,个人与公共数字终端存在普及成本高昂的问题,还存在“老年人无需高性能设备”的认知误区,导致低性能设备难以应对老年人不熟练的操作习惯,同时终端设计未充分考量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在无形层面,应用软件的交互逻辑与老年人的思维、语言习惯脱节,例如依赖抽象符号而非直观文字提示,增加了老年人操作障碍。“当老年人产生关闭数字设备某一界面的想法时,首先联想到的是‘关闭’这样的文字提示,而不是两条线段交叉形成的图像符号。”^[33]融入工具的适老化改造,本质就是重建关怀者

与被关怀者的相遇场景。首先,应推动建立数字工具适老化专项标准与评估体系,明确个人智能终端的性能底线、公共服务终端的生理适配指标,并配套建立设备采购补贴机制,针对低收入老年家庭提供购置补贴,避免“成本门槛”成为相遇障碍;同时,工具设计需明确“谁是潜在关怀者”,通过预留远程控制等交互功能实现子女远程协助、社区在线服务,为关怀关系的存续预留空间。其次,在有形终端设计上,可针对老年人手部肌力衰退、视力变化等特点,优化设备细节,例如公共缴费终端增设“老年模式”物理快捷键,一键切换至大字体、简化流程界面;在无形应用交互上,可深度结合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逻辑与生活经验,应用“场景化交互语言”,例如购物 App 中“退货”功能的提示可关联“找商家把东西退回去”的日常表达,而非抽象的“售后申请”,减少老年人的认知负担。

推行普同模式,敞开回应态度。左拉(Irving Kenneth Zola)基于“普遍的障碍感”和“需求的普遍性”,在对残障问题的理解上提出了障碍的普同模式策略。他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残障者数量将不断增加,障碍将不再是少数人的经验,而将是每个个体都会面临的风险,差别只在于风险出现的早晚有所不同。^[34]数字服务提供者往往过度强调老年人在数字融入中的特殊性,却忽视其作为社会参与主体的重要身份,当老年人在接触数字技术、尝试融入过程中遭遇障碍时,这些提供者常以漠视、消极应付的态度对待,甚至默认老年人应当回归传统方式处理社会事务,而非主动回应其数字需求。从诺丁斯关怀伦理的内在逻辑来看,这一问题直接断裂了关怀关系形成的核心环节,是对关怀伦理中“义务感”的背离。关怀者在与被关怀者相遇时,需秉持“我在这里”的敞开态度,并将这种义务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由此,应推动行业建立数字服务的“普同回应标准”,将“积极回应老年人数字需求”明确纳入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考核体系,比如要求政务服务平台、生活服务类 App 必须设立老年人需求专属响应通道,规定响应时限与回应规范,避免推诿至传统方式,从制度层面落实关怀者在数字场域中的“可及性”与“回应义务”。

(二) 凝聚社会合力,培育回应主体

在“形成关系”与“回应需要”之间衔接着重要的一环,即作为关怀行动主体的关怀者。在推动老年人实现良性数字融入的实践中,不仅需要提高关怀者的回应能力,还需要引导老年人走向“自我关怀”的境界,成为自己的关怀者。

倡导主动融入,实现自我赋能。当前老年人在数字融入中存在被动融入占主导、主体回应能力缺失的问题。部分数字融入实践将技术监测等同于融入本身,例如在数字健康领域,通过设备实时监测老年人的行为轨迹、身体数据以保障联络应答,看似实现了关怀者对老年人的关注与回应的准备,实则老年人的需求完全由技术设备间接表达,自身并未参与数字服务的主动使用。他们既无法自主发起健康数据的查看与管理,也难以根据自身需求调整数字工具的使用方式。诺丁斯强调,关怀关系并非关怀者的单向付出,还需要被关怀者通过自身的回应参与其中,被关怀者的“回应”同样是关怀关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7]19},而被动融入恰恰剥夺了老年人的回应空间。这一思路指出,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核心不仅关乎技术使用能力的提升,更在于关怀主体意识的培育,让老年人在数字实践中重新获得回应能力,真正成为关怀关系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因此,应推动整合老年大学、社区服务中心、数字企业等多方资源,开展数字融入能力培育项目,结合老年人的兴趣需求设计课程,引导老年人自主发起数字活动、主动运用大语言模型解决疑问等。在代际反哺中,应让老年人与子女、社区服务者共同参与数字任务,先由服务者倾听其具体需求,再引导老年人自主操作,在此过程中鼓励老年人随时反馈操作困惑,让老年人感受到自身需求在融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此外,组织已具备基础数字技能的老年人成立“数字关怀互助小组”,让他们以关怀者身份帮助其他老年人学习主动使用数字服务。

打造专业体系,开展教学培训。数字素养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情境需要,个体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能力与态度的综合”^[35],包括“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36]的维度。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是,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培训缺乏成熟的体系化与建制化支撑,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数字素养框架构建不完善,在国内现有研究中,针对老年人的框架或聚焦媒介与信息素养却对新兴数字技术覆盖有限,或为适用于全体居民的通用框架,未能充分贴合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特殊需求;二是培训实施环节存在明显缺口,“由谁来教”的主体协同问题尚未解决,“如何去教”的方法也未落地,培训方式、内容设计与客体分层未能精准匹配老年人认知特点与真实需求。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关怀关系中关怀者回应能力的缺失。宏观层面,应由政府牵头联合老年大学、图书馆、数字企业等机构制定认证标准,将“回应能力”“在场互动”纳入核心指标。参与认证的培训主体应当是掌握老年人认知特点的“数字导师”团队,培训框架需覆盖新兴数字技术应用与伦理风险规避;对通过认证的培训主体,给予政策补贴与资源倾斜,从而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建立跨机构协作的“数字包容联盟”,从制度层面将分散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培育关怀主体的合力。在师资培育上,组织开展联合培训,通过“认知模拟体验”使其切身理解老年人的数字障碍;培训方式层面,应强调线上线下相结合、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模式,并优化学习资源的配置,保证“教育红利”对老年人的“可及性”;培训内容层面,依托社区开展老年人数字需求前置调研,让培训内容精准回应真实需求,同时根据其现有水平与个体特征提供“阶梯式”培训。^[37]

(三)识别真实需要,给予持续关怀

将关怀内嵌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全过程体现在:首先,避免关怀关系的断裂是融入必要性的基础;其次,融入的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应以提升关怀者的回应能力为核心导向;最后,应通过识别“真需要”、解决“真问题”进一步实现关怀。

平衡关怀方向,避免数字依赖。在实现老年人数字融入后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然困扰着部分银发冲浪者,即数字依赖,或言之,网络沉迷。网络沉迷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线下关怀的缺乏甚至缺失是其中一个常被提到的原因。“亲子间‘爱而不亲’的情感张力、社区参与的消失共同强化了老年人的孤独感,进而诱发了网络成瘾问题。”^[38]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表明老年人对情感陪伴、人际互动的需求未得到及时回应,只能转向数字空间寻求代偿;同时,关怀者将数字关怀简单等同于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唯一方式,忽视了具身关怀与脱域关怀的平衡,违背了关怀伦理中“回应真实需要”的原则,导致关怀因需求与回应的错位而出现偏差。因此,即使数字融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新时代的关怀模式,我们也不能忽略传统的具身性关怀;只有保证具身关怀与脱域关怀的平衡,才能避免老年人被“困在”数字世界里。

开拓线上劳动,彰显老年价值。在驳斥“老年人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时,西塞罗曾认为,不能从事积极的体力工作或许难以否认,^{[39]¹⁴⁻¹⁵}但是老年人依然可以从事积极的脑力工作,而这比体力工作更加重要。老年人毫无疑问拥有在晚年继续实现自我价值并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在诺丁斯看来,“可接受性”的需要在老年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老年人肉身的衰弱使得诸多行动变得力不从心,不顾生理条件贸然行动则有可能伤及健康甚至生命。数字技术让老年人更多地从事脑力劳动成为可能,然而,目前国家、社会机构、企业等未精准识别老年人通过脑力劳动彰显价值的迫切需求,也未提供适配的资源与保障来回应这一需求。在此提议,人社部门、行业协会及互联网企业可通过社区调研、线上问卷等方式,全面采集老年人的职业背景、技能特长与劳动意愿,建立动态更新的“老年数字人才库”;再对接企业、公益组织的线上岗位需求,开发如线上非遗文化教学等适配岗位,实现老年人需求与岗位资源的精准对接;同时配套出台老年人线上劳动权益保障细则,明确工作时长上限、报酬结算周期、意外风险保障等内容,消除老年人参与的后顾之忧。此外,针对匹配的岗位优化操作流程,开发简易版工作界面,确保每一项线上劳动资源都能精准回应老年人的能力特点与价值追求,让有意愿的老年人能通过线上劳动追求自我价值。

保留断连空间,丰富包容内涵。在号召老年人进行数字融入的过程中,还应审慎看待断连现象。对于非技术使用者而言,断连的实质是被动的、非自愿的。^[16]首先,对断连的包容应当作为数字融入

的准备阶段、过渡方式和风险保障。数字排斥与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要求社会为非数字的,也就是断连状态下的生活提供可能,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意外断连后的非常态化情况提供的应急保障。其次,对于技术使用者而言,断连是个体反连接意识的强化行为。研究发现,在后连接主义的技术背景下,出于隐私担忧和保护、生活和工作边界的冲突、感知过载和倦怠的考虑,许多个体日益呼唤断连的权利。^[16]呼吁为老年人乃至所有数字化生存下的个体保留断连权并不代表着要让老年人重返数字融入前的状态,对于数字弱势群体来说,数字融入前的断连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数字融入后的断连则是积极主动的选择。老年人首先要完成数字融入,才能拥有选择断连与否的权利。断连空间的保留是对老年人数字自主权的尊重。在数字时代,数字异化的潜在阴影始终笼罩在每一个个体之上,断连不仅代表着一种对待技术的态度,更是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守护,而这,才是对数字包容的内涵更全面的理解。

四、结语

在对老年人数字融入问题的探讨中,本研究从以诺丁斯为代表的关怀伦理的角度出发,用一种认识上的独特视角,深入分析了构建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路径的必要性,深入地思考了在构建包容性社会的道路上需要注意的问题和细节,并据此提出了具体的对策。首先,在理论上,本研究将关怀伦理与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研究进行深度结合,尝试超越已有研究在理论应用上浮于表面的局限。从时代维度看,数字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代际断裂使得老年人的传统经验在数字时代面临价值弱化;从空间维度看,数字迁徙使传统社区、家庭等物理关怀空间的功能弱化;从人的维度看,作为被关怀者的老年人存在身体机能衰退、认知能力下降和依赖固有思维的特征,但同时他们也渴望维持尊严与自主性。关怀伦理的视角有效地揭示了这三个维度的复杂性,也正因如此,从多角度凝聚各方合力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问题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其次,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立足于关怀伦理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三条融入路径,即构建相遇空间、凝聚社会合力和识别真实需求,这为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

最后,本研究对于核心问题的探索和解决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亟待后续的研究进行补充完善。一方面,为回应老年人内部的多维差异并破解数字融入的多层次障碍,分类别、分层面研究老年人数字融入问题尤为重要。老年群体在年龄、健康状态、城乡背景等维度存在显著异质性,数字融入问题也嵌套于个体、家庭、社会、技术等多层次结构中。因此,分类别、分层面研究的终极目标,即是将关怀伦理的“关系-回应-需求”机制转化为更具操作性的实践方案。另一方面,还应推动多学科合作研究,以求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构建整合性解决方案。老年人数字融入问题涉及伦理学、社会学、老年学、心理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理论,单一学科的方法难以全面捕捉该问题的复杂性。唯有打破学科研究的壁垒,共同探索更加全面有效的老年人良性数字融入策略,才能真正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数字时代享受到应有的尊严与幸福。

参考文献:

- [1] 国家数据局.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 (2024-06-30) [2024-08-05]. <https://www.szzg.gov.cn/2024/szzg/xyzx/202406/P020240630600725771219.pdf>.
- [2] 蒋俏蕾,陈宗海. 银发冲浪族的积极老龄化:互联网使用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12):41-48.
- [3] 郭小弦,申欣悦,李晓光. 共享数字时代的福祉: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宁夏社会科学,2023(5):156-165.
- [4] 靳永爱,胡文波,冯阳. 数字时代的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人生活——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人口研究,2024,48(1):40-55.
- [5] 王羽. 关怀伦理视角下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发展研究,2024,41(3):36-42.

- [6] 翟绍琪,彭迎春,张志颖,等.老龄健康风险冲击下的社区老年照护关怀体系探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3,40(7):491-493+507.
- [7] 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8] 闫慧,孙立立.1989年以来国内外数字鸿沟研究回顾:内涵、表现维度及影响因素综述.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8(5):82-94.
- [9] 薛翔,马海云,赵宇翔,等.活动理论视角下的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结构与路径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22,39(6):78-88.
- [10] 戚聿东,徐凯歌.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光明日报,2023-10-03(7).
- [11] 王张华,朱柳.“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电子政务,2023(11):94-103.
- [12] TSATSOU P. Vulnerable people and digital inclusio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perspectiv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 [13] 董君,洪兴建.数字鸿沟的内涵、影响因素与测度.中国统计,2019(12):71-73.
- [14] 徐文洋,俞世伟.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与消解.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3):306-318.
- [15] 孙天梦,郑欣.刚需性融入:银发冲浪族的数字社会化及其隐性不平等.编辑之友,2024(4):56-64.
- [16] 陈雪薇,张鹏霞.“不在线是一种奢望”:断连的理论阐释与研究进展.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4):39-48.
- [17] 周裕琼,谢奋.从老年传播到老龄化传播:一个边缘研究领域的主流化想象.新闻与写作,2021(3):30-37.
- [18] 闫慧,张鑫灿,殷宪斌.数字包容研究进展:内涵、影响因素与公共政策.图书与情报,2018(3):80-89.
- [19] 杨菊华,刘轶锋.数字时代的长寿红利: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可行能力与内生动力.行政管理改革,2022(1):26-36.
- [20] 武小西.数智时代老年人的能动性建构研究——以护理机器人为切入点.道德与文明,2024(1):43-52.
- [21] 谢秋山,岳婷.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必要性及路径研究.当代继续教育,2019,37(4):10-16.
- [22] 袁方.老年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 [23] 陈炜伟.7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新华社.(2019-08-22)[2024-08-05].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22/c_1124909249.htm.
- [24] BAI R, LIU Y, ZHANG L, et al. Projections of future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up to 2035:a modelling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2023,8(12):e915-e922.
- [25] 许小玲.数字反哺视域下农村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及治理策略.兰州学刊,2024(9):150-160.
- [26] 洪杰文,李欣.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9,41(10):50-74.
- [27] 申琦,张锐君.家国间的张与弛: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老龄社会数字包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4(6):105-115.
- [28] 尤吾兵.认同伦理视角下老年人数字身份的“遮蔽”与“解蔽”.中州学刊,2024(10):98-106.
- [29] 申琦,胡湛.老龄社会的数字藩篱困境及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5):79-87.
- [30] 袁红,黄庆庆.数字弱势群体数字排斥的关键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研究——基于理论—政策协同度视角.情报理论与实践,2025,48(1):104-113.
- [31] 陈欢.西方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江汉论坛,2022(1):23-28.
- [32] 张容南.重视脆弱性的老龄关怀.道德与文明,2024(1):33-42.
- [33] 武文颖,朱金德.弥合数字鸿沟: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困境与突围.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44(1):162-169+213.
- [34] ZOLA I K. Toward the necessary universalizing of a disability policy. The milbank quarterly,1989,67(Supplement 2):401-428.
- [35] 陈明明,陈雨.中国居民数字素养的基本内涵、水平测度及结构特征.电子政务,2024(9):93-94.
- [36]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2021-11-05)[2024-08-05].https://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37] 商宪丽,张俊,陈国宏,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实践与启示——以TSS计划为例.图书

- 馆,2024(2):109-117.
- [38] 贾煜,刘天元,杨旸.困在手机里: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网络成瘾.新闻大学,2023(10):31-45+120-121.
- [39] 西塞罗.西塞罗三论:老年·友谊·责任.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A Study on Constructing a Path of Benign Digital Integration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thic of Care

Wu Wenyi(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 Shenghua(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migration, people's life-worlds are increasingly expanding into or even shifting toward digital spaces. Although the ongoing Digital China initiative has profoundly accelera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various digit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persist. In particular,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vide and widespread longevity make the digital inclusion of older adults a matter of special concern. While achieving self-worth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r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lderly, their inherent vulnerability warrants the provision of care. The ethic of care, represented by Nel Noddings, which emphasizes relation, sets out a series of prerequisites for the formation of caring relation, including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carer and the cared-for and the carer's response to the cared-for's needs. Digital migration both broadens and relocates the domains in which caring relations can form, and thus the ethic of care offers a fresh lens through which to reconsider older adults' digital existence and to elucidate the motiva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ir inclusion. From this theoretical standpoint, fostering the positive integration of older adults into digital environments requires action along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constructing spaces for encounter, mobilizing collective support, and identifying genuine needs.

Key words: the ethic of care; digital divide; digital inclusion

■收稿日期:2024-12-10

■作者单位:武文颖,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管声华,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肖劲草